

# 刘向校书同僚学行考论

王承略 杨锦先

西汉后期成、哀年间，刘向父子主持、领导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校书活动，前后长达二十余年，成为中国学术史、文化史上不朽的盛事。这次校书活动的意义，首先在于将先秦、西汉间杂乱糅莠的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使每一种书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传本；其次，基于对典籍的考察，梳理了先秦、西汉间学术发展的源流和线索，并通过综合性的书目《别录》、《七略》体现出来；第三，在校书实践和叙录撰写的过程中，发现并宣扬了古文经学的优点，为古文经学的勃兴提供了条件，并由此进一步促使今文经学的逐渐衰落。班固盛赞“刘向司籍，辩章旧闻”，“九流以别”，荀悦《汉纪》亦称：“刘向父子典校经籍，而新义分方，九流区别，典籍益彰矣。”都是对校书活动的成就和贡献给予的明确的肯定。

这次校书活动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有一个优秀的学者群体全力投入，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分工协作，从而保证了校书工作的顺利进行。当时到底有多少、有哪些学者参加了校书活动，现在已难以尽考了，不过就现有资料而言，尚可考见十有余人，这大体能反映出当时学者参入校书的一般情况，对他们的学行进行一番仔细的考察，对于从总体上把握和认识校书活动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对可知诸参加人的了解还是很粗略的。在此

我们不揣谫陋，力图将所有能考知的参加者汇为一编，逐个考究他们的生平事迹，分析他们的学术特色，以见他们参加校书的条件及在校书中的作用和功绩，其有史料未及或推断失误之处，请专家批评指正。

## 一、刘 向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汉宗室。高祖刘交，是刘邦同父少弟，封楚元王。曾祖刘富，红侯。祖刘辟疆，官终宗正。父刘德，宗正、阳城侯。刘向年十二为辇郎，既冠，以品行端正擢为谏大夫，坐铸伪黄金事免官。宣帝时初立《穀梁春秋》，应征受《穀梁》之学，参与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即位，进散骑宗正给事中，因触怒外戚许、史及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先后两次下狱，免为庶人。成帝即位，方得进用，召拜为中郎，领护三辅都水，迁光禄大夫。河平三年，受诏领校秘书。时外戚大将军王凤秉政专权，后宫赵、卫等亦逾蹈礼制，风俗日趋奢淫，乃著《洪范五行传记》、《列女传》、《新序》、《说苑》以戒成帝，颇得成帝信任，迁中垒校尉。成帝数次欲用为九卿，都被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阻止，所以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餘年而不得高升，绥和元年或绥和二年一、二月间卒于官<sup>①</sup>，年七十二。

刘向一生中仕途几经起伏，总起来看尚受重用，但始终未践高官。面对外戚日盛、皇权衰落的局面，他忧心忡忡，但步履维艰，无法奋起力挽狂澜，他只能利用今文经学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理论作为武器，同外戚宦官进行斗争。事实证明，不管他付出多大的努力，都不能挽救汉家政权垂亡的命运了。他卒后十三年，王莽最终代汉自立。不过刘向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和佗僚失落，丝毫不损于他作为一个博学大儒、谦谦君子的形象，他以洁正自守、渊雅博洽为当世人所钦服，也许正因如此，他被任命为校书活动的领导者，而他后半生主要的精力，也大都用在了校书上。

刘向既总领校书，又负责主校六艺、诸子、诗赋，就他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成就而言，承担这样的任务绰绰有餘，这就使他成为校书中至关紧要的中心人物，下面针对他的学术渊源和学术特色，作一个大略的考察。

第一，刘向精《易》学。《汉书·楚元王传》载“歆及向始皆治《易》”，又载刘向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儒林传》载：“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艺文志》载：“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可见刘向父子三人都对《易经》深有研究，都可以称得上是《易》学专家。

第二，刘向精《诗》学。刘向的高祖刘交与申培俱受《诗》于浮丘伯，后刘交又遣子郢客前往师门受业。刘交卒，郢客嗣楚元王，以申培为中大夫，辅佐太子戊。又史载刘交“诸子皆读《诗》”，自然也包括刘向曾祖刘富在内。至向祖刘辟疆，“亦好读《诗》”，“武帝时以宗室子随二千石论议，冠诸宗室”。可见，刘向家族有着良好的《诗》学传统。因申培与刘家的特殊关系，一般认为刘向所习，即是《鲁诗》，但王引之、马瑞辰举证刘向所学实为《韩诗》，要之不管怎样，刘向深通《诗》学，却是事实。

第三，刘向精《穀梁春秋》。《公羊春秋》自武帝时立于学官，《穀梁春秋》却一直不受重视。宣帝时始立《穀梁》博士，特诏刘向受学。《汉书·儒林传》载，甘露元年，《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于石渠阁评论《公羊》、《穀梁》异同，二家各出五人，刘向名在《穀梁》之列，讨论了三十馀事，萧望之等多以《穀梁》为是，从此《穀梁》之学大盛，亦被列于学官。毫无疑问，《穀梁》学的兴起，刘向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四，刘向精《公羊春秋》。董仲舒是《公羊》学的大师，刘向非常推重他，称“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sup>②</sup>。《汉书·陈汤传》载刘向上疏，援

用《公羊》之义。刘向解说春秋灾异，亦有多处与董仲舒之说相合。可见刘向以《穀梁》经师的身份兼通《公羊》之学。

第五，刘向精《左氏春秋》。桓谭《新论》曰：“刘子政、子骏、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王充《论衡·按书篇》亦云：“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妇女，皆呻吟之。”刘向编撰的《洪范五行传记》、《新序》、《说范》、《列女传》等书，也对《左氏》之义多有发明<sup>③</sup>，可见刘向深谙《春秋左传》。

第六，刘向精今文《尚书》。刘向撰《洪范五行传记》十一卷已经亡佚，但遗说见存于《汉书·五行志》。《五行志》先引“经曰”，次“传曰”，次“说曰”，次逐条分记。王鸣盛以为，经是《尚书·洪范》，传是伏生《洪范五行传》，说是欧阳、大小夏侯之说。赵翼则以为，传是夏侯始昌《洪范五行传》。无论伏生也罢，夏侯始昌也罢，总之俱是今文《尚书》之学，何况夏侯始昌正是伏生的三传弟子。刘向因《传》推演而成《记》，足见刘向之言灾异，与今文《尚书》学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

第七，刘向精诸子之学。史载刘向之父刘德“修黄老术”，“常持《老子》知足之计”。《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刘向说老子》四篇，正是家学的最好体现。此外，传世《管子》、《晏子》、《列子》、《邓析子》、《孙卿子》、《韩非子》诸叙录，刘向俱能因人究学，发为弘论，足见刘向深通诸子之学。

第八，刘向善辞赋。刘向父刘德、祖刘辟疆皆有诗赋名，刘向亦以文章显，史载：“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艺文志》著录《刘向赋》三十三篇即是。若论汉大赋的成就，自当首推武帝时的司马相如、成帝时的扬雄，但刘向当为二人之间，其赋作在宣、元之际，足可睥睨当世。

第九，刘向通历法。《汉书·律历志》载：“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可见刘向对于历法是深有研究

的。

准上所述，刘向通《易》、《诗》、《穀梁春秋》、《公羊春秋》、《左氏春秋》、今文《尚书》，可以说是一个并不排斥古文经说而又能兼容今文各家经说的今文经学的大师，在西汉后期是经学传承上的重要人物。他又精研诸子、历法，且以文章名世，因而称得上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博学家。唯其如此，确立了他在校书活动中无容争议的“领校”地位。若一定要论对校书活动的贡献，自当以刘向劳苦功高。他也因此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成为两汉学者群中几难伦比的翘楚，千百年来，一直巍然屹立于古代学术史、文化史、图书史研究的颠峰。

## 二、刘 歆

刘歆，字子骏，刘向少子。年少而通《诗》《书》，能属文，颇得成帝喜爱，欲用为中常侍，被大将军王凤阻止，歆乃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阳朔三年，王莽二十四岁，亦为黄门郎，从此开始了二人数十年的交往。河平中，歆受诏与父同校秘书，父子携手校书近二十年，直到刘向去世，尚未藏事。哀帝即位，时王莽为大司马，荐歆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受命总领校书，继续完成父向未竟之业。建平元年，歆改名为秀，字颖叔。改名的原因，《汉书》应劭注，《后汉书·窦融传》俱以为冀应图讖<sup>④</sup>。此事虽难以尽信，但似也反映了其人一种不甘平庸的心态。是年四月，歆与王龚等校完《山海经》并奏上。此后不久，因先前争立古文经，移书责让太常博士，触怒执政大臣，遭到群儒怨谤，刘歆惧怕被杀，要求外出补吏，历官河内、五原、涿郡太守，数年，以病免官。大概在元寿二年，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会哀帝卒，王莽执政，奏明太后，太后留用为右曹太中大夫。元始二年，王莽欲以女配平帝，时刘歆以太中大夫行太常事。三年春，以光禄大夫受诏杂定婚礼。此后，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五年，因助王莽恢复明堂、辟雍之制，封红休侯。居摄二

年，翟义起兵讨伐王莽，莽命歆为扬武将军，统兵屯宛，以为戒备。三年元月，始归故官。九月，王莽母卒，时歆以羲和兼少阿，主持议定丧服。始建国元年，封为国师、嘉新公，位列四辅。地皇四年七月，谋叛王莽，被迫自杀，卒时年七十余。

综观刘歆的一生，四十岁以前助父校书，其时刘向与外戚王氏的斗争及刘向官场上的失落，都不能不对刘歆产生巨大的影响。年轻的刘歆无可回避地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为之付出的沉重代价，就是连续二十多年，一直做一个小小的黄门郎。绝望的境遇、冷酷的现实使刘歆意识到，仅仅象刘向那样通过言阴阳灾异、天人感应来维护汉家政权的稳固还是远远不够的。适值当时学风由重文学、事粉饰到言礼制、追古昔的转变，又加上他在校书时得以尽观中秘书，他终于发现了古文经学的优点，并自觉地把古文经学当作新的思想理论武器。然而今文经学经官方近二百年的豢养和扶植，早已根深蒂固，当刘歆缺乏足够强大的政治后盾，贸然高举古文经的大旗向今文经学发起进攻的时候，他注定要失败。他理所当然地被逼离朝，一时间成为万人唾骂、远离学界的孤独者。此时早已青云直上、手握重权的少时僚友王莽却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本来，刘向与外戚王氏构怨很深，而刘歆倡导古文经学的初衷也未尝不是为了建立更强有力的皇权统治，乍看起来，刘氏父子与外戚王氏是格格不入的政治劲敌。然而此时的刘歆实在再也忍不住数十年来的寂莫和无聊，为了实现自己的宿愿，他别无选择地谋求王氏的庇护和支持，而王莽为了能顺利地托古改制，也需要刘歆博学好古的精神和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就这样，二人一拍即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学术背景下，变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体。古文经学在刘歆手里也异化成了迎合王莽政治的舆论工具和施政纲领。这是多么令刘歆痛心和内疚的事实！但历史的必然、时势的发展迫使刘歆身不由己、义无反顾地延续他人生的痛苦。不过，那份痛苦换取的回报是丰厚而诱人的：显赫的官职、学术理想的实现、学界的领袖地位，这些也正

是刘歆孜孜以求的。但他毕竟是刘姓后裔，有着儒家刻骨铭心的正统观念，当莽新王朝崩溃离析的前夜，他不能不批判地反省和审视自己的后半生，他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毅然叛莽，令人不难想见，成仁与成功对当时的他来说实没有多大的区别了。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同自己的后半生告别，从而划下了耐人寻味的人生句号。

刘歆的家学与刘向初无二致，但刘歆所学，似较刘向更为弘博，而且在古文经、天文、吕律、礼制等领域比刘向更为专深。史载歆“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正因为他的博学比之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使他完全能够胜任后期校书的领导工作，并能在短时间内，把校过的所有典籍，“种别为《七略》”。由于有了他的种别，才使先秦、西汉学术朗若列眉、斑斑可考。若就此而论，刘歆之有功于中国学术文化，确实是无以复加的。范文澜把《七略》与《史记》等同看待，誉之为史学史上最辉煌的成就，正代表了当今学界的公论。

作为对校书活动最大的贡献，刘歆在建平元年奏进《七略》。不过，《七略》的编成，只标志着二十年校书工作的一大结集，而不标志着校书工作的终结。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平帝初年，王莽秉政，“刘歆典文章”，可见刘歆返朝以后，仍然继续从事校书工作。《后汉书·苏竟列传》载：“王莽时，与刘歆等共典校书。”此又可见，新莽时期校书活动仍未停止。当时又有扬雄校书天禄阁上，毫无疑问，也是刘歆领导的校书事业的一部分。

### 三、任 宏

任宏，字伟公，河平中以武职（步兵校尉）受诏与刘向一起校书。元延三年，由护军都尉迁太仆。绥和元年初，由太仆迁执金吾，守大鸿胪，持节迎请定陶王刘欣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哀帝。十一月因故贬为代郡太守。此后事迹不详。

任宏的主要贡献在于主校兵书。自西周东迁，历春秋、战国、

楚汉数百年的动荡战乱，适应作战和外交的实际需要，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兵书。西汉建立以后，外有四邻之衅，内有侯王之乱，战事仍然频繁。高祖初年，张良、韩信受命序次兵法，首次对兵书进行了整理，把见存的一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为三十五家。校定完毕，藏于秘府。吕后时，诸吕用事，盗为己用。武帝时，军政杨仆摺摭遗逸，再次对兵书进行整辑，并纪奏《兵录》。这部《兵录》大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提要性的专科书目。《兵录》共著录了多少家，不得而知。《汉书·艺文志》称这次整辑“犹未能备”，可见杨仆所做，很可能是因陋就简、略为条理而已。然而张良、韩信、杨仆的先后处置，毕竟为任宏的校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七略·兵书略》共著录六十三家，比张、韩所定只多出了二十八家，可见任宏的校书任务并不繁重。不过，任宏做出了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把六十三家之书，根据内容的不同，区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建立了最早的切于实用的兵书分类体系，刘歆因之而成《兵书略》，此后一直为后世所祖述。毫无疑问，《七略》总体的分类体系的建立，其中有任宏的一份功绩。

#### 四、尹 咸

尹咸，汝南人，河平中以太史令受诏与刘向一起校书，后为丞相史，平帝时为大司农。其他事迹不详。

尹咸父尹更始，字翁君，是宣、元间的大儒，精通《穀梁春秋》，甘露元年，以议郎的身份与刘向一道参与讲论《公》《穀》异同，由此而进谏大夫、长乐户将。他又兼通《左氏春秋》，取先师之说撰为章句，授尹咸、翟方进、胡常、房凤。时刘歆校中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为喜爱，乃从尹咸、翟方进受业，质问大义。尹、刘二家两代四人，俱兼通《左氏》、《穀梁》，数十年中，同处一个学术阵营，彼此的关系在师友之间，真可以称得上是学林佳话。史载“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可见尹咸首先是以经学成名并参与校书的。但他官太史令，主校数术之书

(占卜之书)自然成了他的分内之事。幸好数术之书尽管杂乱,前贤已有清理总结,可以因承借鉴。《汉书·艺文志》载:“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春秋时鲁有梓慎,郑有裨灶,晋有卜偃,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汉有唐都,庶得粗讷。盖有因而成易,无因而成难,故因旧书以序数术为六种。”既言因旧书,则武帝时的唐都、落下闳等人,肯定对数术之书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整理。不过即便如此,《数术略》收录一百九十家之多,尹咸工作量之大还是不难想见的。

## 五、李柱国

李柱国,河平中以侍医(《隋书·经籍志》作太医监)受诏与刘向一起校书,主校方技(医药之书),是当时参与校书而能独挡一面的重要人物,因史家记载不详,他的生平事迹迄今一无所知,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 六、班 旂

班旂是《汉书·艺文志》未载而参与刘向校书的重要人物。《汉书·叙传》载,班旂“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旂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可见刘向等人每校定一书,写就叙录,誊清定本,呈献成帝时,多由班旂进读,成帝非常欣赏他的才能,就把秘书的副本赐给他。当时典籍流传不广,成帝叔父东平思王刘宇上疏求诸子书及《太史公书》而不得,班旂能有秘书副本,足见成帝对他的宠爱。此后班旂家学人辈出,与家藏秘书不无密切的关系。

班旂是班固的从祖父。班固的曾祖班况有三子,长曰班伯,次即班旂,少即班固祖父班稚。班旂生于初元四年<sup>⑤</sup>,少而聪颖,以博学著称于世,大概在鸿嘉前后,也就是班旂二十五岁左右,左将军史丹荐举贤良方正,以对策为议郎。其后迁谏大夫、右曹中

郎将，始助刘向校书。很显然，班固不是校书活动最早的参加者，他参与校书时，已是校书活动的中叶。王先谦《汉书补注》因忽视了对班固年龄的考察，又曲解了《汉书》原文，结果误把班固参加校书的时间提前了近十年。《汉书·叙传》称班固早卒，由此不难推知，他的卒年较之刘向的卒年，前后相差不是很远。

## 七、杜 参

杜参亦为《汉书·艺文志》所未载而参与刘向校书者之一。其事迹见于文献记载者凡四处。（一）《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博士弟子杜参赋二篇”，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臣向谨与长社尉杜参校中秘书。’刘歆又云：‘参，杜陵人，以阳朔元年病死，死时年二十余。’”（二）《北史·文苑传》载，北齐天保七年，樊逊受诏校书，议曰：“案汉中垒校尉刘向受诏校书，每一书竟，表上，辄言臣向书，长水校尉臣参书，太常博士书，中外书，合若干本，以相比较，然后杀青。”《北齐书·文苑传》记载略同。（三）见存刘向《晏子书录》云：“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讎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除重复二十二篇，定著八篇。”（四）见存刘向《列子书录》云：“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参，校讎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重复十二篇，定著八篇。”末署：“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比较上面四段文字，不难发现，有两处矛盾的地方。第一，刘歆云杜参卒于阳朔元年（前24年），而《列子书录》记载永始三年（前14年）刘向与杜参校定《列子》并奏上；第二，颜注引《别录》及《晏子书录》、《列子书录》皆称杜参为长社尉，而《北史》、《北齐书》载樊逊议作长水校尉。长社尉只不过是个小吏，长水校尉却是秩禄二千石的高官。

就第一个矛盾而言，判定刘歆之语与《列子书录》的真伪是

很难的。颜师古注引刘歆云云，想必是《七略》中的文字，刘歆在《七略》中记时人时事，天下共知，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作伪，那么刘歆之语谅必不诬。刘向校定的《列子》早已失传，今本《列子》一般认为是魏晋间伪书（其间或保存有先秦时代部分原始文献），魏晋之时《别录》尚存，刘向的《列子书录》就在其中，作伪者纵然可以伪造一部《列子》，但决不敢虚造一篇书录，否则无异于掩耳盗铃，不打自招，所以今存《列子书录》按理说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杜参官长社尉抑或长水校尉，实际上与他的生卒年寿有极大的关联。如果杜参不是卒于阳朔元年（也就是说刘歆之语不足信），而在永始三年仍然在世（也就是说《列子书录》可信），那么他做官做到长水校尉是极有可能的。何况樊逊、李延寿的时代，《别录》未亡，杜参的官职在诸书录中随处可见，二人一为校书家，一为史学家，不至于粗心到把长社尉误为长水校尉的地步。当然，如果杜参确实卒于阳朔元年，卒时年仅二十余（也就是说刘歆之语可信，《列子书录》不可信），那么说他位居长水校尉这样的高官就很难令人相信了。总之，由于文献真伪莫辨，杜参的生平也就很难确定。我们只能从龃龉不合的材料中推知，他是参与刘向校书的重要人物，家富藏书，且能把家藏贡献出来，以供校书之用，他在校书中的具体工作，可能主要襄助刘向校诸子书。

## 八、房 凤

房凤，亦未见载于《汉书·艺文志》而曾参与刘歆校书。据《汉书·儒林传》，房凤字子元，琅邪郡不其县人，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太常举方正，为县令都尉，失官。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奏除补长史，荐其明经通达，擢为光禄大夫，迁五官中郎将，与光禄勋王龚、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三人皆侍中。刘歆请立《左氏春秋》，哀帝令与今文博士讨论，但诸儒皆不肯置对。刘歆于是数次拜见丞相孔光，求光相助，被光拒绝。房凤本是《左氏》专

家，亲炙尹更始之门，在学术上是刘歆的师辈，大概由于学术观点的一致，乃与王龚一道支持刘歆，三人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大司空师丹论奏三人诋毁先帝所立，三人被迫同时离朝，外出补吏，房凤为九江太守，至青州牧。此后事迹不详。由于史料的匮乏，房凤在校书活动中到底做了哪些工作，不得而知，但他是以与刘歆同等的官职并且是以辈份更高的经师身份参与校书的，想必应该是校书后期较为重要的负责者之一。

## 九、王 龚

王龚，亦为《汉书·艺文志》未载而参与刘歆校书的重要人物。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和《汉书·儒林传》，王龚字子即，是汉宣帝王皇后的亲属，绥和二年，由侍中光禄大夫迁卫尉，在官仅两月，迁侍中光禄勋<sup>⑥</sup>，开始与刘歆、房凤一起校书，因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于建平元年下半年出为弘农太守，此后事迹不详。王龚是以外戚和九卿的身份参与校书的，地位和官职都不在刘歆之下，所以他与房凤一样，亦应该是后期校书较为重要的负责者之一。他对校书活动的贡献，今唯一能考知者，在于参与了《山海经》的校理工作，详见下文“□望”条。

## 十、□ 望

传世《山海经书录》云：“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书录》最后题署为：“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诏太常属臣望校治，侍中光禄勋臣龚、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主省。”另外，今本《山海经》卷九、卷十三的卷后，也分别有与《书录》题署完全相同的文字。臣秀就是刘歆，臣龚只能是王龚。臣望是谁，却一直难以确定。吴任臣《山海经广注》疑其为丁望。考《汉书·百官公卿表》，建平元年，丁望官卫尉，卫尉位列九卿，非太常属官，何况丁望是哀帝生母的叔父，哀帝已于绥和二年四

月即位，断无次年丁望尚微处待诏太常属之理，所以臣望决非丁望，可成定论，吴任臣的推断，是不能成立的。

遍检《汉书》，成、哀、王莽间名“望”者有下列几人：（一）严望。据《朱云传》，严望，九江人，能传朱云之学，为博士，官至泰山太守。（二）方望。据《宣元六王传》，方望，平陵人，颇知天文，更始时迎请孺子刘婴自长安至临泾，立为天子，不久被更始遣将击败。（三）王望。据《李寻传》，李寻好言阴阳灾异，尝向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举荐王望。又《王莽传》，地皇四年有侍中王望，不知是否即李寻举荐之人。（四）蛸望。据《百官公卿表》，蛸望于建平三年由将作大匠迁执金吾。（五）□望。据《外戚传》，其人于哀帝时曾参与调查成帝妃许美人及中宫史曹宫生子之事。

以上五人（或是六人）之中，严望是博士，是太常属官。方望颇知天文，王望受荐于好言灾异的李寻，二人与太常属官太史、太卜等或许有一定的关联。唯蛸望、□望看似与太常属关系不大。比较而言，所谓臣望者，最有可能是严望。当然，亦有可能是其他四人之一，更有可能另有其人。因缺乏坚确的证据，看来只能得出这样一个模糊不定的结论。

## 十一、刘 伋

刘伋，刘向长子，以《易》教授，官至郡守。其他事迹不详。《广弘明集》卷三载梁阮孝绪《七录序》云，孝成之世，“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歆等雠校篇籍”。阮氏提到刘向及刘向之子俊、歆，但刘向共有三子，长曰伋，次曰赐，少曰歆，并无名俊者，所以俊字似应是伋字之讹，果真如此，则刘伋同父、弟一道，一开始就参加了校书活动。当然，俊字也有可能是骏字之误，那么“子骏歆”仅指刘歆，与刘伋无涉，不过如此行文，揆诸句法语意，总显得扞格难通。总之，仅凭一条文字上尚有错讹的孤证，当然得不出刘伋一定参加校书的结论。然而考虑到刘赐早卒因而《七

录序》不曾提及的事实及刘向校书的情形，刘伋参加校书工作，应该是情理中事。

## 十二、富 参

传世刘向《管子书录》云：“所校讎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刘向校书，以中秘书为主，同时也广罗其他官私藏书，以相参校。故校《管子》时，除中书外，又有太史书、太中大夫卜圭书、臣富参书、射声校尉立书。书录撰写的通例，凡参加校书者称臣，非参加校书而仅借用其书者不称臣，所以所谓臣富参者，亦是校书工作中的一员。可惜事迹只字不存，其在校书中的贡献也就无由考知了。

## 十三、□ 叙

传世《邓析子书录》云：“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重复，为一篇。”按照书录的通例，臣叙也是校书参加者，但他的姓氏及事迹，今皆已无从考见了。

《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崇文总目》曰：“邓析子，战国时人，《汉志》二篇。初，析著书四篇，刘歆有目有一篇，凡五，歆复校为二篇。”姚振宗以为“目有”似“自有”之误，并指出《崇文总目》据旧本叙录之说，应属可信，所以《邓析子书录》中的臣叙，似应是臣歆之讹。姚氏乃一代目录学大家，凡所持论，皆有见地，今迻录其说，以备参考。

以上考论刘向校书参加者凡十三人。除十三人外，刘向的学生冯商，刘向的次子刘赐，或许也曾参与校书。校书工作前后长达二十多年，参与其事的学者想必为数不少，可惜史无明文，多数已湮掩无闻。在可以考知的十三人之中，李柱国、富参的生平

一无所知，杜参的事迹相互矛盾，臣望的身份迄难断定，刘伋、臣叙尚在两可之间，其余七人，除向、歆始末斑斑可考外，任宏、尹咸、班斿、房凤、王龚只能略知人生片段而已，至于他们在校书活动中承担的具体工作以及做出了怎样的贡献，皆因史料奇缺，不能一一认知并作出准确的评判。但通过如上对每位参加者学术和生平的分析，仍然可以得出下列几个简单的结论。第一，成哀之际校书实际参加者是一个学术群体，其中的刘向、刘歆、尹咸、班斿、房凤、刘伋等人，都是当时知名的经学家，而且一般都有较高的官职和学术地位，这样就使校书有相当充分的学术准备和人才优势。第二，校书工作一开始就注意了专家的分工合作，由刘向总领其事，又把典籍分为若干门类，分别由学有所长的专家分校，如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李柱国校方技。除此主要的数人外，又有不少一般参与其事者，而尤其注重吸收青年学者，象刘伋、刘歆、班斿、杜参、臣望参加校书时，大概都只有二十余岁，刘歆校《列女传》，杜参校《晏子》、《列子》，臣望校《山海经》等，都能与老年学者密切配合。可见在校书中，除了图书门类的分工合作，又有老年青年学者的分工合作。第三，校书挖掘、整理、宣扬了古文经学，深深影响了校书工作者。比如刘向是成帝时言灾异的主要代表人物，晚年亦转而言礼制；他本是《穀梁》学的大师，同时也深通《左氏》之学；至于刘歆、房凤、王龚携手移书责让今文博士，更成为学术思想史上不朽的壮举。总之，这是一次成功的校书活动，它在当时的现实意义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足可以与孔门整理保存六经相提并论。以向、歆父子为首的校书学者群体，对于中国的典籍和学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丰功伟绩，必将光争日月，流传千古。

注：

① 综合考察《汉书·礼乐志》所载及成帝、翟方进的卒年，只能得出这样一个近似的结论。

②《汉书·董仲舒传》引。

③ 说详章炳麟《刘子政左氏说》、刘师培《左氏学行于西汉考》。

④ 钱穆对此提出异议，以为刘歆改名，实为避哀帝刘欣嫌名。考上古音歆在侵部，欣在文部，中古音歆在侵部，欣在欣部，二者读音相差甚远，何况西汉时并不避嫌名，故钱穆之说非是。此采音韵学专家刘晓东先生之说。

⑤ 考《汉书·叙传》及《汉书·张汤传》，知班旂之兄班伯生于初元四年，王莽亦生于此年，而王莽兄事班旂，则班旂必生于初元四年。

⑥ 《百官公卿表》载，绥和二年，“卫尉王能为侍中光禄勋，二年贬为弘农，坐吕宽自杀”。其中能字乃龚字之讹，“坐吕宽自杀”乃错简或衍文。因考据繁琐，兹从略。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古籍所、山东大学图书馆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

---

## 《西夏文字典》出版

西夏文字是一千年前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创制并使用的文字，后世失传。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被重新发现，因识者寥寥，被称作“天书”。研究这种文字及其文献的“西夏学”被称为“绝学”。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外西夏学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夏学已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但迄今为止，世界上尚未正式出版过一部西夏文字典。

中国西夏学专家李范文教授，在西夏古国故地宁夏长期从事西夏文字和西夏历史的研究，为了不使西夏文字失传，李范文教授历经艰辛，用了25年的时间终于编成这部长达150万字的巨著。据介绍，西夏文共计5800个字，而这部字典将各种异体字均收入其中，共计6000字。这部字典在内容上集古今中外西夏文字研究之大成，用汉文、英文两种文字释义。字典的分类采用了四角号码分类法，不懂西夏文字的读者只要用汉字的四角号码分类法，可很快学会检索。这部字典现已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 周颂安 •